

亞當·斯密 經濟思想研究

邹柏松 著



1.33

粤新登字09号

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研究

邹柏松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东风东路725号)

广东省龙门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226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5361-0816-8/F·92

定价：3.90元

前　　言

亚当·斯密（1723——1790年）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和创始人之一。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是政治经济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这部巨著使政治经济学这门“最古老而又最新颖的艺术”，第一次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马克思对此评论说：“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①

《国富论》自1776年问世以来，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行列中，有些人继承了斯密经济思想中的科学成分，把英国古典经济学推进了新的高度；有些人则继承了斯密经济思想中错误的东西，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也有许多人严重歪曲了斯密的理论体系，磨灭了它的时代精神。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破产，在西方出现了一般“复兴”古典经济学的潮流，重新产生了一阵子“斯密热”。这股潮流无疑会促进对斯密经济思想的研究，但是，应该指出在不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笔下，斯密和他的《国富论》的本来面目受到了歪曲。因此，我们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把那些被歪曲的事实予以澄清，还斯密和《国富论》的本来面目。

我国自从实行开放改革政策以来，被十年浩劫中断了的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又重新开展起来。但是，应该看到我国学术界对斯密和《国富论》的研究，往往形成了统一的格式，这

①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81页。

就是按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来评述斯密的理论体系；把马克思有关对斯密经济学说的部分理论问题的评述、摘引，当作斯密经济学说的全部内容。因此，我们一直都比较集中研究斯密的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再生产理论，等等，对斯密这些理论的研究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这些理论显然没有包括斯密经济思想的全部内容。事实上，斯密在《国富论》中，不仅对价值论、分配论、再生产理论等作了分析，而且还极其详尽而系统地阐发了有关商品经济、市场机制、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思想，这些思想哺育了在他以后差不多所有的经济学家的成长。可以说，亚当·斯密的旗帜，就是商品经济的象征。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本书力图打破传统的格式，以《国富论》理论体系为线索，比较全面去分析和评价斯密的经济思想，这对于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

作者

1991年8月30日于华南师大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 章 亚当·斯密——一位“苏格兰才子” …	(1)
第二 章 《国富论》——划时代的著作……	(14)
第三 章 《国富论》中的“奇怪的思路” ……	(32)
第四 章 分工、交换和货币理论……	(50)
第五 章 价值理论的几个问题剖析……	(70)
第六 章 关于三种收入的理论……	(99)
第七 章 再生产理论与“斯密教条” ……	(120)
第八 章 生产劳动和资本理论……	(136)
第九 章 对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55)
第十 章 关于消费问题的论述……	(169)
第十一章 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	(186)
第十二章 “经济人” ……	(215)
第十三章 自由竞争学说……	(233)
第十四章 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251)
第十五章 国际贸易学说……	(269)
第十六章 财政理论……	(288)
第十七章 斯密与中国……	(304)
后记……	(333)

第一章 亚当·斯密——一位 “苏格兰才子”

一、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

亚当·斯密（1723—1790年）是英国工场手工业鼎盛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他生活在英国工场手工业高度发展和产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期，比威廉·配第整整晚了一个世纪。配第所处的十七世纪的英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而到斯密生活的十八世纪中叶的英国，已由农业国转变为以工场手工业占据首位的工业国。这时英国的纺织业、制铁业、造船业等都很发达，毛织业生产也遍布全国。英国的产业资本已超过商业资本，变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但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是以分工和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无论是工人专门从事一个部件的加工还是一道工序的操作，都大大提高了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减少了劳动的非生产消耗，并使劳动工具在操作简单化的趋向中得到大幅度的改进，从而显著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社会生产力。英国在工场手工业跃居生产首位的同时，使用机械的生产也逐渐产生。继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飞梭之后，1764年兰开夏一个织工兼木匠哈格里夫斯又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同年瓦特又发明了蒸汽机，并经1784年改进

后解决了动力问题。这些都显示出英国工场手工业正在开始朝着大机器生产过渡，斯密就生活在这个刚刚开始过渡的时期。

1744年以后英国进行的几次对法战争，特别是1756—1763年同法国争夺北美和印度的七年战争的胜利，更使英国成为拥有大量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强国，海外市场不断扩大。1772年同1702年相比，对外贸易额增长了两倍，居世界首位。在战争中，资产者获得了大量的国债利息，进一步加速了资本积累。在农业方面，资本主义化的进程在十八世纪也大大加快。1700年到1801年一百年间被圈占的农民土地达349万英亩，大批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所有这些都为英国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展提供了巨额资金、廉价劳动力和广阔的原料来源与销售市场。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各个领域取得进展，到了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在城市已明显地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农村，由于革命后圈地运动更加猛烈发展，小农经济已基本被消灭，而普遍建立起资本主义大农场。农场的土地归地主阶级所有，他们依靠出租土地过着寄生性的生活。这样，英国便形成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地主阶级。

随着英国圈地运动发展而使小农经济为资本主义大农业所代替的过程的基本结束，标志着英国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随后，英国经济的发展就要靠资本主义积累进行了。但是，资本主义积累却有着许多障碍需要扫除：

第一，当时占居首位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基础太狭窄，劳动生产率不高，剥削的剩余价值有限。因此，用机械来代

替手工生产的历史任务已经迫切提出来。实际上当时的工场手工业已经为机械生产准备了技术前提，而且机械生产也已经开始。随着资本原始积累任务的完成，产业革命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机械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了。

第二，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受到封建残余势力的限制。英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大地主阶级和封建贵族利用在议会中的多数把持着政府和社会中的一切重要职务，他们继续颁布限制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法令、法规。这些法令、法规严重束缚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发展，妨碍着各种技术和新工艺的采用。

第三，当时保护关税的阻挠。保护关税政策是英国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之一，因而曾对资本主义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经过一系列的商业战争，特别是经过十七世纪中叶三次英荷战争和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英国已经取得了海上霸权和大量殖民地。到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年，英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一的商业和殖民地强国。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再也不怕在国际市场上的自由竞争，相反，自由竞争倒是同弱小的对手进行斗争的最好武器。因此，过去成为促进英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保护关税制度，这时反而成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绊脚石。

当时英国资产阶级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努力增加资本积累，推进产业革命，迅速向大机器生产过渡，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这一历史任务的主要障碍，则是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之间的矛盾。因此，历史的发展迫切要求彻底扫除封建残余，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解除重商主义

政策的束缚，实行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以保证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和产业革命的顺利进行。从理论上论证这一时代要求，是当时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斯密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脱颖而出，他积极地探索增加资本主义财富的途径，热情倡导经济自由，创立了自己的经济学说。

二、亚当·斯密生平

亚当·斯密的家乡是苏格兰的克尔卡弟镇。1723年6月5日，当他降生时，不幸的是他已经几个月前失去了父亲。斯密的父亲是律师、苏格兰的军法官和柯卡尔迪地区的海关监督，还担任过苏格兰大臣劳登伯爵的私人秘书。斯密的母亲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地区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在斯密四岁那年，有一次他独自从外祖父家出去游玩时，被一群到处流浪的吉卜赛人拐走，幸经家人及时追寻才平安回到家里。在孤儿寡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斯密的母亲全力支持他上了苏格兰的第一流中学。在学校里，斯密是一个学习勤奋，喜欢读书，记忆力很强的学生。到十四岁时，他已经在古典文学、数学等方面充分具备了进入大学的能力。1737年10月，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斯密进入学术自由气氛较浓的格拉斯哥大学，专攻数学和自然哲学。在这段时期里，他结识了两位对他以后的学术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良师益友。一位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1694年—1746），另一位是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卫·休谟。1740年，斯密获斯内尔奖学金，前往牛津大学上学。在那里，他曾经因为阅读休

漠的《人性论》而遭到严厉的训斥，并且因此而把授予他学位的时间推迟了两年。1746年，斯密在牛津大学毕业后回到苏格兰。1748年接受爱丁堡大学的聘请，开始了教师的生涯。1751年，斯密就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讲授道德哲学。讲义的第二部分为伦理学，后来斯密把它改写为《道德情操论》并于1759年出版。这本书的内容，不仅有道德、伦理、心理学方面的内容，还有关于政府政策和经济问题的分析。这本书出版后。被称为“苏格兰才子”的斯密从此名闻遐迩，成为人们崇拜的名教授，不少学生从英格兰、瑞士、俄国、美国前来听课。但从此以后斯密的研究兴趣发生了明显变化，他放下伦理学，转向法学和政治经济学。

1764年，在休漠的建议下，斯密辞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的职务，作为巴克勋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出国旅行。在欧洲大陆旅行期间，斯密改变了一向幽居的习惯，开始频繁地出入社交界，成为著名文学沙龙的常客。巴黎的沙龙，是思想大师荟萃的场所。在这里，经休漠的介绍，斯密结识了霍尔巴赫、爱尔维修、魁奈、杜尔阁、狄德罗等有名人物。特别是同法国的重农学派的接触十分密切，魁奈和杜尔阁的思想对斯密影响深远。在斯密的学说中包含着许多重农主义的因素，他虽然批判了“农业是唯一生产劳动”的观点，但他仍然认为，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下，重农主义在许多学说中最接近于真理。在这段时期里，斯密开始写书，这本书就是《国富论》。

1766年冬，斯密回到英国，辞去私人教师职务，返回故里克尔卡弟镇，和母亲住在一起，开始了闭门著书的生涯。1773年春，《国富论》写作基本完成。斯密携带书稿经常出

入伦敦，征求一些学者的意见，进行修改。1776年，《国富论》又经三年的锤炼，终于问世。这一年斯密已经五十二岁，他拿着这么多年心血的结晶十分感慨地说：“如果魁奈医生尚在，我当将《国富论》献给他”可惜这时魁奈已经逝世两年了。

1777年，斯密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专员。在爱丁堡，他除了奉公守职外，还对《国富论》一书作了大量的增补。1786年，《国富论》的第四个版本问世。1787年—1789年，斯密被选为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名誉校长。

斯密一生未婚，终生依恋、侍奉着他的母亲。老母九十高龄，早他六年去世，斯密从此身体状况恶化，1790年7月，斯密与世长辞，葬在卡农加蒂教堂的墓地。简朴的墓碑上写着：“《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安眠于此。”

三、斯密生平中几件事辨析

斯密的一生经历非常平凡，但后人对斯密一生中的几件事却众说纷纭。

首先，是如何看待斯密在两次职务上的变动，斯密作为一个学者，一辈子都和书本打交道，据说斯密一生有三大乐趣：即同母亲、朋友和书本在一起。他有三千多册藏书。斯密的一生可以概括为读书、教书和写书这样三部曲。但是斯密在1764年突然辞去了格拉斯哥大学教授的职位，去充当一个默默无闻的英国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并陪伴他去欧洲大陆旅行。1778年，斯密又接受了任命他为苏格兰海关专员的职务。斯密在职务上突然改变的动机是什么呢？如何看待这两

次在职务上的改变对他的著述活动的影响，后人说法不一。一位斯密传记作者耶珂文谷说：“一位闻名的教授去改充一个英国贵族的默默无闻的家庭教师，这是什么打算呢？他是不是由于金钱的打算呢？这我可不知道了”^①这种说法当然不妥，因为它与斯密的为人处事相矛盾。斯密是一位具有很高道德修养的人，他经常为慈善事业秘密地捐献大笔金钱，而这些捐献都超过了他的财产所允许的范围。在他去世后，留下的遗产非常有限。另一位斯密传记作者杜格尔德·斯图尔特（1753—1829年）对斯密这两次选择都有评论。他认为斯密当家庭教师“中断了那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事业，在这个事业中，只有他一人有希望完成那凭借其熠熠才华所抱有的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而当海关专员，“浪费了他大量的精力，分散了他的注意力，现在，他的事业告一段落，他不能不痛惜被公务消耗的时间，他不能用于对社会更有益、与他的才智更相称的工作。”^②斯图尔特在这里谈到的斯密未完成的写作计划，是指斯密在完成《道德情操论》之后，曾经抱有的一个巨大的异乎寻常的计划，想对世界提供一个包括人类和社会各方面生活的、整个社会学说的体系。后来从发现的一本关于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课的学生笔记中看到，斯密对完成这一庞大计划的基本观点、材料和大致的轮廓都已经具备。可惜的是斯密仅仅利用了这个讲稿的一小部分，这就是后来完成的巨著《国富论》。斯密的写作计划没有完成，是与他的学者生涯的中断有直接关系。但是不能像斯图

^①转引自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39页。

^②转引自约翰·雷《亚当·斯密传》，第204页，302页—303页。

尔特那样对这件事持简单的否定态度，特别是对斯密在职业的第一次选择。另一位著名的斯密传记作者约翰·雷说得很好：“毫无疑义，如果斯密一生不离开格拉斯哥大学，他也能写出一些具有永久价值的著作。不过，不言自明，这些著作将不同于现在留给我们的。”①约翰·雷说得很道理，因为斯密在伴随巴克勒公爵旅游欧洲大陆期间，他同法国重农主义者有过多次交往，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十八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国家象法国那样有那么多的在经济方面的重要而又饶有兴趣的问题需要人们去研究。当时法国有大批才能出众、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们，他们聚集在魁奈的周围，出版他们自己的刊物，传播自己的学说，宣传自己的主张。当时斯密同这些经济学家交往甚密，使斯密经常得到许多新颖的对比和思考的材料，这无疑会使斯密本来就有过的经济思想逐步成熟起来。斯密批判地吸取了重农主义学说中的本质东西，补充了自己学说中的不足部分，使他的思想更丰满。可以说，没有斯密与重农主义者的交往，就没有他的《国富论》。

斯图尔特对斯密去做海关专员一事的批评却完全是正确的。的确，繁锁的公务耗去了斯密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自然使他无暇去完成他的计划。斯密自己也曾经说过：“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国富论》的作者。”②卢森贝也指出：“在‘原富’出版后，斯密的创造力好像就枯涸了：他

① 约翰·雷《亚当·斯密传》，第204页。

② 见约翰·雷《亚当·斯密传》，第324页。

从此以后，再没有写过什么值得注意的著作”。^①当然，在斯密许多未能整理的材料中包含着不少非常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如果斯密不当那个该死的海关专员的话，他是有时间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到了1785年时，斯密曾经想再出二本书：一本是哲学史，另一本是关于法律和政府的理论及历史。但这时斯密年事已高，体力衰弱。他说：“我原打算写更多的东西，我的原稿中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材料。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②斯密就是带着这样的憾事瞑目的。这不仅对斯密个人来说是件憾事，而且对整个人类思想的进程来说，也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其次，据斯密传记的一些作者记载，斯密有一种爱独自出神发呆的毛病，斯密的这种毛病使他闹了不少笑话。比如，有一次他在思考问题时穿着睡衣走出房间到花园散步，但他一来到花园便走上了通向大路的小道，接着便走上了大路，在沉思冥想中一直走了十五英里，最后教堂的钟声才把他从深入的思考中解脱出来。又有一次，斯密陪伴朋友参观格拉斯哥的一座工厂，行走时由于心不在焉，正巧掉进了装有鞣料渣的坑里。还有，一次斯密作为海关税务专员需要在公文上签字，他没有写自己的名字，而是模仿他前面刚签了名的海关税务专员的名字。据说，斯密的朋友谁也不愿同他结伴玩纸牌的，因为斯密玩着玩着就会想起了什么，他就暗垫牌，或忘记叫牌，等等。有人认为斯密这个毛病是一种病态的反映。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其实这不过是斯密潜心思考的

^① 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1卷，第241页。

^② 见约·雷翰《亚当·斯密传》，第393页。

一种表现，它表明斯密对学问的钻研程度，已经达到了那种专心致志、出神入化的境界。凡是在这种场合下，斯密已经忘掉了周围的事情，而专心驰骋在深奥的思维的领域内，在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那里都可以找出类似斯密的事例来的。斯密传记作者约翰·雷分析斯密平时出神发呆的原因时说：“是一种长时间注意力过度集中的结果，而我们这个世界正是由于他的思想过度集中而得到了很多好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是思想家的思想痉挛。”^①斯密在写作《国富论》期间给朋友的信中也提到他是怎样专心致志的，他说：“我在本地的工作就是研究，这一个月，我废寝忘食地埋头从事研究。我的乐趣是一个人在海边漫步。您大约知道我是怎样消磨时间的！”^②

第三，关于斯密在临终前销毁自己手稿的问题。每当斯密感到他的健康情况恶化时，他委托朋友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他认为不值得发表的文稿焚毁。例如，1773年4月斯密准备携带《国富论》原稿去伦敦，因为过度劳累，身体和精神都非常衰弱，他担心书没有印出来的时候自己便会死去。因此他委托休谟做他的遗著管理人，他写信给休谟，告诉他万一死了应如何处理他的遗稿。他在信中说，除了他随身带的那部分稿件（即《国富论》）以外，其余全不值得发表。“所有其他未装订的原稿，有些放在那个写字台的抽屉里，有些放在我卧室中装有玻璃门的柜子里，柜子里还有大约十八本未装订好的原稿，每本很薄，所有这些原稿都不必仔细翻

①见约翰·雷《亚当·斯密传》，第302页。

②见约翰·雷《亚当·斯密传》，第217页。

阅，我希望您把它们毁掉。”^①十四年后，当他又想去伦敦时，他又嘱咐他委托处理著作的朋友说，他死后务必将他的全部手稿焚毁。因此，在临终的前一个星期，斯密特意把一些朋友叫来，要他们当着他的面立即把手稿销毁。手稿被销毁后，斯密似乎大大松了一口气。斯密的这些举动，并不是他什么反常行为，恰恰说明斯密的治学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他本打算利用这些材料写些东西，但他没有能够做到这点，他宁愿把这些手稿付诸一炬也不愿意把这些半生不熟的手稿公布于世。在这一点上，斯密可以和马克思、恩格斯相媲美的。马克思、恩格斯宁可让那些不成熟的手稿去受老鼠牙齿的批判，也不愿意匆忙发表。因此，斯密这种严肃的治学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第四，在谈到斯密的一些个人品质时候，卢森贝曾经说：“斯密是一个大胆的经济学家，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开拓了新的发展道路；然而在私生活方面，他是非常守本分的，是十分懦弱而且充满着小市民慈善心的一个人……”。^②如果斯密在私生活方面真的是这样的人，他怎么会在事业上取得伟大的成就？事实上，综观斯密的一生，他作为一个学者，不仅有渊博的学识，而且还有很高的修养和许多可贵的品质。据约翰·雷的记载，斯密是这样一个人：“待人亲切是他的技巧”，“他不仅性情温和，举止优雅，而且富于机智，学识渊博，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人物。”、“他是一个道德修养很高、注意实际的哲学家，他爽快、开朗，毫无常见于本国思想家的那种炫耀才学之处，”、“他以不同

①见约翰·雷《亚当·斯密传》，第237页。

②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一卷，第242页。

凡俗的正直、和蔼可亲的品质赢得了同事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非凡的天赋、卓越的才能和真诚地传授有益知识的孜孜不倦精神，使他成了杰出的教授”^①等等。所以，斯密的那种正直、诚实、认真、谦虚、仁慈、为人厚道、与人为善等方面的优良品质，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由于斯密具有这样的优良品质，使他有良好的学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第五，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出版后，他的研究兴趣转向政治经济学。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呢？后人有不同看法，但我认为斯密这一转变，是同他在格拉斯哥等地进行广泛的社会观察和学术活动分不开的。当时苏格兰中部是英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格拉斯哥又是苏格兰中部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斯密在格拉斯哥学习特别是工作期间，以敏锐的眼光仔细观察这座城市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不仅抓住了当时英国社会的主要经济问题，而且为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同时，当时在格拉斯哥出现的浓厚的理论研究气氛对斯密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格拉斯哥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有待解决的种种经济问题，例如税收问题、银行券的发行和消除贸易限制等。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格拉斯哥的大商人、银行家、市长科克伦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就创立了一个英国最早的经济学会（当时称为俱乐部），坚持每星期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各种经济问题。斯密作为这个学会的会员，经常出席会议参加讨论。斯密通过参加学会的活动，同格拉斯哥经济界人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以至同科克伦等人结为至交，加深了他对英国经济生活和经

①见约翰·雷《亚当·斯密传》，第189、190、155页。